

南方周末 2020-2021 学年乡村教育观察报告

2021 年 7 月 29 日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南方周末公益基金

排版注意：标黄处为一手采访资料，用于后期排版做 box 用。

前言

走过中国超过 1100 个县市，是种什么体验？

南方周末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民兄弟、在城市奋战不停的农民工兄弟、在工厂流水线夜以继日的工人兄弟.....

行走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我们透视迷雾、铲清险阻、亲历发生。

作为以问题为导向的调研项目，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本次采取的是田野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模式，在过往的 4 年时间，脚步踏遍 200 余个地市、1100 余个县域，走访农村不计其数。

为了获取一线案例资料，项目展开访谈式调研，访谈对象包括乡村区域内中小学校长、老师，及学校其他管理干部、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

最终从五个角度深度剖析乡村教育现状：课程、师资、载体、再分配和家庭。

由此回答一系列关键问题：老师教什么？（即学生学什么？）在撤点并校等一系列乡村教育发展困境下，谁来教？通过怎样的方式可以克服师资先天不均衡？如何实现乡村教育资源合理再分配？怎样保证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缺失的家庭教育怎样弥补.....

一系列问题之前困扰着我们，如今仍未解释完全。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在调研中，我们看到一群人和一些群体在努力。有的深入一线，探索乡村学校教育模式；有的发挥专长，在信息化教学的弯道上实现超车；有的找寻本真，推动父母在克服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回归家庭。

为此，《南方周末 2020-2021 学年乡村教育观察报告》（以下简称为“本报告”）将会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找到具有可能性的解决案例，提出解决模式。

如上，如下，不过冰山一角。

我们深知自己的观察不能穷尽，但借此提出来自一线的需求和疑惑，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为乡村教育振兴之路挖出曾经掩埋的路引，试图找到更加便捷、高效的途径。

本报告项目组
2021年7月20日

第一部分：数据

第一章 报告相关情况说明

一、调研方法

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相结合的调研方法；

深度访谈通过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保定学院等数十家乡村教育合作机构和乡村教育主管部门渠道，进行线上电话或线下访谈本人。

调查问卷及抽样按照每个学校不超过 2 位、每个县区不超过 10 位的抽样模式，通过电子问卷及纸质问卷形式，调研样本 2000 余个。

田野调查通过实地走访中国近 200 余个地市、1100 余个县域，不计其数的农村，零距离观察中国乡村教育现状，记录调查中经历的真实事件，获得更加真实的信息资料。

二、调研范围

1、调研对象：乡镇及以下区域中小学校长、老师、学生，处于义务阶段且具有农村户籍的辍学、失学青少年等；

2、调研区域：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市、重庆市。计 25 个省级行政单位。

3、访谈情况

类别	身份	数量（单位：位）	时长（单位：小时）
乡村小学	管理人员	21	10.5
	一线教师	35	14
	学生（含辍学学生）	10	5
	家长（含辍学学生家长）	11	5.1
乡村中学	管理人员	17	9.3
	一线教师	22	11.8
	学生（含辍学学生）	12	6.5
	家长（含辍学学生家长）	7	2.8
相关部门	基层教育主管部门	3	3.1
	村两委干部	9	4.5
社会机构	公益机构负责人	9	5
	学者	7	7.5
	媒体从业者	13	10

4、调查时间：2021 年 3 月 1 日-2021 年 7 月 20 日

三、术语界定（待补充）

名词	解释
乡村区域	乡镇及以下区域
乡村学校	地处乡镇及以下区域，且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
适龄青少年	处于义务教育就读阶段的青少年
失学青少年	处于义务教育就读阶段但未就读的青少年
载体/教学载体	即承担教学必要的固定资产

第二部分：议题

第二章 课程：学什么？

国外著名教育学家麦克·扬认为“教育实际上就是知识的选择，以及人的选择。” [1]知识的选择系统化后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课程，客观来说，课程对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

“课程”英语对应 Curriculum，较早见于斯宾塞的《教育论》，他把教学内容的系统组织，称之为“课程”。之后的研究者多从个人研究点出发，对课程进行了种种界定，主要有以下定义：学习的内容、学习方案、获得的经验或者活动计划。 [2]

而我国施良方教授概括了课程的六种定义：教学科目、有计划的教学活动、预期的学习结果、学习经验、社会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改造。 [3]

在教育的日常话语中，我们通常认为课程是教育科目及其体系。

不论是城市教育还是乡村教育，课程是建构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课程建设是保证课程质量的关键。本报告在调查乡村教育相关情况时，课程是重要的考察指标。

一、“残、虚、乱”的乡村课程体系

2019年3月11日教育部发布《乡村振兴必先振兴乡村教育》一文，文中明确提出“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课程，满足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需要”这一乡村课程设置要求。[4]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完善课程设置。学校美育课程以艺术课程为主体，主要包括音乐、美术、书法、舞蹈、戏剧、戏曲、影视等课程。[5]

除此之外，在2020年3月和11月相继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分别强调广泛组织开展实践活动和多渠道拓展实践场所的重要性。[6]

但是乡村教育课程现状是怎样的呢？课程设置是否又实现了“针对性”和多样化？实践活动又何以实现？

通过调查访谈发现，乡村教育小学阶段，语文、数学、英语三大主科的地位不可撼动，但音体美及思想品德等科目的开设情况令人担忧：开设的学校要么没有专业老师授课，要么干脆留给孩子“自行发挥”，一位老师身兼数职，副科课程的意义难以觅见。

一名一线的乡村教师说到：“英语、体育、音乐、美术等专职教师缺乏严重，有些老师身兼几门课程”。而这样的情况无疑会影响教学质量提高和素质教育实施。

本报告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乡村学校对于课程的设置均非常基础，小学以语、数、外三大科目为主，中学则以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九大科目为主，其他美术、音乐、体育、计算机课程虽也有开设，但是更多元化的课程例如科学仅占比50%，其他心理健康等课程设置更加稀少。

中学阶段，中考压力扑面而来，在访谈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部分学校课程只分为考的和不开的科目，这样的情况在地处乡镇的中学中尤为突出。七年级阶段尚能保证课程覆盖，年级增加后，这样的课程普遍成了学生们的奢望。而体育则因为在部分地域一跃成为中考科目而备受重视，可见“考什么学什么”的氛围仍然存在。

另外，随着各地逐渐重视素质教育，乡村学校逐渐开始重视家乡、校本等拓展性课程教育，但通过相关报道发现，校本课程仍然常以提高学生应试能力与学业成绩为最终目的，衡量校本课程是否恰当的标准也由个别主体包办，随意性较强。

乡村教育由于其不成熟性，乡村的课程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去乡村化和城市化倾向，出现学习、模仿甚至是照搬城市课程体系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况会带来课程“水土不服”的结果。

学者唐松林和姚尧称乡村为“应试的孤岛”，乡村教育重在升学，学校与村落隔离、学校与社会脱节、思想与乡土相距甚远，乡村教育的课程多与学生们日常生活“泾渭分明”。

这也可以称为乡村教育课程内容与乡土文化脱节。

乡村教育课程内容与乡土文化脱节，其本质是乡村中独具特色的各类资源，在设置课程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充分开发。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乡村教育课程呈现出“残”、“虚”和“乱”三个特点。

“残”即课程体系残缺，且不论多样性的美育课程体系难以建构，课程体系的完整度难以保持。调查显示，整体来说乡村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偏向应试，很多素质类课程设置不多。

“虚”即乡村课程体系的支撑力不夯实，师资队伍缺乏，存在非常多的乡村教师兼任多门科目的情况。

“乱”，即乡村学校课程存在不可持续的特点，稳定性和延续性不强，存在经常随着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是校长意志发生转移的情况，导致教师和学生难以深入理解和实施课程。

二、难以持久的新鲜感：乡村支教是修正还是扰乱？

1996 年始，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科技部等 14 部委联合开展了大学生“三下乡”活动，各大高校的暑期“三下乡”以支教和调查为主。[7]

1998 年底教育部出台《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8]，大学扩招的开始直接促使参加短期支教人数的增加。

近几年，大学生支教活动成为热潮。

根据支教时间可把支教可分为“长期支教”和“短期支教”两种类型。长期支教一般是指志愿者在支教学校持续支教一学期以上时间的支教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保证教学任务正常进行，科学系统和可持续性为长期支教的关键。[9]

短期支教一般是指寒暑假等较短时间的支教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对留守儿童进行短期辅导或陪伴。该类支教活动争议较多，部分学者认为，短期支教虽然从对乡村儿童的辅导和陪伴来看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从教学角度来看，作用甚小。[10]

不少高校、社会团体均推出短期或长期支教，支教会给乡村教育课程体系带来什么变化？

为了维持多样化的课程设计，保持拓展课程的开设，短期支教老师成为乡村小学的“救命稻草”，有老师表示对于支教老师的态度，“校长就一句话：‘你尽管来，教什么都行。’”

短期支教老师进入乡村校园时，带去的一般都是一些“新玩意”，比如英语演讲、戏剧表演、卫生安全教育、性教育等话题。然而，乡村学校本身对于这些课程的主题鲜有提及，大部分都在依赖短期支教老师在暑假、寒假给学生进行实效性很短的课程教学。

不可否认，调查结果也显示短期支教是可以为乡村儿童带来积极影响，不论是从帮助乡村儿童建立自信，还是提高支教儿童的学习兴趣及增加支教儿童的知识面。[10]

但是暑期支教热潮一过，留给乡村儿童的是什麼？留给支教者的又是什麼？

对于乡村儿童来说，这是一场短暂的相识，不少孩子在调查中都表达了对支教老师的感激，更多还有想念，这一场支教盛宴背后，支教者收获了自我满足，而结果的承受者是被支教的儿童。

“他会觉得你突然闯入他的生活，然后带来了一个新鲜的教学模式，然后你就走了，不上不下。你给予他一道光，又快速的把这个光给堵住了。”商凝瑶表达了自己对于短期支教的看法。

从调查访谈的结果来看，短期支教中存在很多问题。

支教讲师团队复杂的参加动机，支教组织匮乏的系统培训，授课团队较强的随意性，各种因素都使得短期支教工作带有较强的主观性。[11]

问卷数据与访谈结果显示，一方面，大多数的支教活动带来的不是课程体系的多样化，知识课程内容的暂时增加。大多数短期支教活动在结束后，大学生回校需要忙自己的事情，仅仅1到3个月甚至是更短时间的支教难以真正给乡村教育的课程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另一方面，短期支教更是暴露出乡村教育课程背后难以支撑的师资力量，正是因为缺老师，支教热潮才能愈来愈高。

短期支教到底给整个乡村教育带来的是课程体系的补充，还是课程体系的再打破？

支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乡村教育原本课程体系弊端，但是从长远来看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支教而解决，更多时候，支教本身也会带来相关问题。

这些问题又会反噬到乡村教育原有的课程体系上，昙花一现背后的阵痛。

三、被忽视的一端：学生们想要什么？

教育家陶行知认为，“乡村教育是培养‘伟大的新生命’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他要运用环境里的活势力，去发展、学习活本领。”[12]

一部分短期支教老师表示，学生对上述拓展课程有极大的兴趣，体现出较强的学习动力，然而学校只在假期期间短暂地、不连贯地、非系统地开设这些课程，实际上没有满足学生学习的好奇心需要。

另外一个问题则在于成年视角带来的狭隘处境。很多孩子在受访时反映，有些课程是他们认为无趣的，但却经常、重复地光顾他们的课堂，有些课程是他们觉得有趣的，却在一次“悄然而至”后，杳无音讯。

在风风火火的乡村教育支援浪潮中，孩子们的声音哪里去了？

课程内容的发出端即教师总是会有很多人关注，但是作为接受者的乡村儿童的话语淹没在了声音的大潮里，而这一环却是至关重要的。

孩子们想要什么？这一端的声音被忽视了。

乡村教师郑老师说学校的教学任务就是按部就班。“课程就是按照课本教纲来，学校除了教学之外，也很少开设课外拓展活动，以前我们还带学生出去搞拓展活动，野炊啊，爬山啊，现在基本上很少开展这样的活动，都是安全第一。”

根据调查结果及访谈结果分析得出，儿童对乡村教育的课程内容也有自己的期待与憧憬。

从调查结果可以反映出，大多数被支教儿童希望在支教过程开设一些新颖的、不同于常规教学科目的课程，如书法、绘本、科学实验、地理常识、历史常识、科技创新、综合教育等。

孩子们的需求与我国 2020 年 10 月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是相契合的。[5]

但是这些课程显然不应试，与乡村教育的现状层层脱节，目的导向的乡村教育不会把学生们的兴趣放在重要的考虑地位，而是功利性较强地设置应试课程。

更进一步来说，这些多元化趣味化的课程背后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师资力量，现有的乡村现状难以支撑。

例如一节趣味化动手的生物课，需要显微镜、实验室和相关的仪器设备，这样的课程无疑对孩子的综合素质培育和视野的拓宽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乡村的硬件标准难以达到。

即使是一些硬件设施达标的学校，这样的课程也需要经过规范化培训的老师，这样的师资在普通的学校都难以觅得，更何况乡村学校。

现实总是很残酷且真实地呈现在那里。

四、出路在望：如何合理乡村教育课程设置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共分国家、地方、学校三个层级进行管理。国家规定的课程由中央统一指定编写。

地方课程则是由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以国家课程标准为基础，根据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特点及其对人才的特殊要求，充分利用地方课程资源而开发、设计、实施，对国家课程构成有效补充。[13]

目前，国家课程已能覆盖到绝大多数农村学校，但体现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的课程开得不多，无法照顾到学生的差异化需求。

不论是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关于课程多样化、课外实践相关的文件，还是孩子们的心声，乡村教育课程体系都需要调整。

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看来，农村教育不能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和补充，总的原则是——农村教育的总培养目标要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具体的课程设计可以参考农村特定的环境。

因地制宜地制定乡村教育课程。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中国经济“压舱石”。更好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好的施行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根据调查访谈结果显示，课程体系的完善与建设需要与足够的师资资源相衔接，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9》显示，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明显，师资队伍向好发展，课程体系的完善和多元的师资支撑在改良。[14]

除此之外，依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以及相关文件具体规定，乡村教育课程体系应该因地制宜、综合借鉴城市发展经验和自身情况建构。[15]

关于课程体系建设，社会上也有不少实践。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推出的“梦想课程”，以学生适应社会所必需的健全品格和关键能力为课程建构的主要方向，以合作、体验、探究为基本的学习方式，建构起与基础教育国家课程互补的结构化的课程体系。

正如“梦想课堂”所说“在梦想课上我们可以唱，可以跳，可以说，可以演，不怕犯错，不怕出丑，我在《理财》课中体验快乐，在《去远方》中憧憬远方，它和我们上的其他课很是不同我们都非常喜欢上梦想课，如果每节课都是梦想课该多好……” [16]

同时，在“互联网+”的大背景环境下，新媒体思维也为乡村教育课程带来新的可能性，从新媒体视域来看，未来新技术是否能够为乡村教育带来新的可能？网络公益课程启动，“互联网+教育”会为乡村教育课程带来何种新的可能性？

而这其中，老师究竟能发挥何种作用？

第三章 师资：谁来教？

“学校是乡村的中心，教师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290 万名乡村教师的坚守为乡村振兴点亮了希望。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大而言之，是为家乡教育尽一份力；小而言之，是为谋生。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教师岗位。”访谈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乡村一线教师这样说道。

在他看来，10 年从教经历中，“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是阻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难题。

2020 年 9 月，教育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聚焦乡村教育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举措，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大背景下，实现乡村教师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乡村教育。[17]

在时代发展大势下，乡村教育需要一支专业性和公共性兼具的高素质的乡村教师队伍，乡村教师不再是传统的教书匠角色，同时被时代赋予公共性的重任，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引导者。

一、教师的专业性要求

教师的专业性与学生的教育、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

因乡村教育体系中各方面资源匹配较弱，所以对老师的专业性需求大、要求高。但从调研结果来看，乡村教师群体由于种种原因，其专业程度与城市相比相差甚远。

在调研的学校对象中，乡村学校教师群体主要由长期在职教师、特岗教师、长期支教老师、短期支教老师构成。

长期在职教师是乡村教育的主要支柱，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策主导下的特岗教师，逐步解决农村学校师资总量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另外，在对乡村学校教师队伍的专业能力评估上，音、体、美等素质科目地位逐渐提高，对乡村学校教师整体水平有了更高要求。

（一）乡村教师学历构成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我国乡村学校的教师基本为专科及以上学历。个别学校因为偏远贫困等原因，也会有大专以下的老师，其中一部分乡村教师的专业素养十分亮眼。

学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队伍理论知识、业务基础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能力，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需要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学术能力，而学历正是衡量二者的基础性标志。

2020年，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曾介绍到，近年来我国乡村教师队伍结构趋于科学合理，35岁（不含）以下教师占43.4%，男教师占比接近40%，本科以上学历占51.6%，中级以上职称占44.7%。[18]

“通过设立‘特岗计划’、公开招聘、定向培养、‘县管校聘’和退休支教等多元培养补充交流机制，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到乡村任教、支教，每年吸引约4.5万名公费师范生到乡村任教。”任友群表示，“特岗计划”实施15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710亿元，累计招聘特岗教师95万人，覆盖中西部省份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18]

在政策指引下，乡村教师队伍的专业性得到提升，学历结构不断优化。

同时，社会和企业各方的支持为乡村地区带来了更多的优质资源，以精细化、立体化的全新公益模式，促进乡村教育水平提升。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开展农村公益帮扶项目，持续推动中国教育均衡发展。其中，新东方突破时空界限所打造的“双师课堂”为乡村教师注入了新鲜的力量。

顾名思义，“双师课堂”是由两位老师共同完成授课。课程由支教教师远程主讲，当地老师作为助教，双方通过直播教学设备进行互动直播教与学。

“双师课堂”赋能于乡村教育，开创了崭新的教学模式。一方面，乡村学生可以和城市学生享受同等的教师资源；另一方面，在互动直播教学中，乡村老师的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国家和社会资源逐步向乡村教育领域倾斜，乡村教师队伍学历结构逐渐优化。然而，城乡之间的鸿沟依然难以弥合。

近几年，深圳中学的教师招聘名单频频引起热议，清一色的世界顶级学府出身，如此豪华的阵容酸了看客的同时，也值得我们深思，实现城乡教育公平，优秀教师资源还需进一步向农村倾斜。

（二）乡村美育教师现状

2020年10月，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时提到：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美育教师人数由2009年的49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74.8万人。十年共增加25.8万，其中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下发四年来，美育教师增加了14.9万人。但从资源配置上看，美育师资队伍仍然缺额较大，专职美育教师分布不均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仍然是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19]

从调研结果来看，乡村美育教师的匮乏问题更为突出。

2016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按照2014年的统计数据，全国乡镇以上的中心校，平均每10所学校只有6位美育老师，这个数字远远落后于美育课程占总体课程11%的比例。[20]

“在乡村学校，一位老师兼授五门学科、八门学科，是再平凡不过的事。美术老师、音乐老师、体育老师，也许都是同一个人。这位老师好像是全能的，然而这里的全能意味着‘全都不能’，因为没有谁是全能的。”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商凝瑶无可奈何的说道。

近年来，我国重点推进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发展，在专项资金的支持及社会公益组织的帮助下，不少中小学修建了塑胶跑道、音乐教室等，为乡村美育提供了载体。

然而，乡村学校即使有美育相关的教学载体，也因为缺乏老师而蒙上灰尘。

“我们之前在贵州，那边的学校硬件很好，有很多爱心人士和机构捐赠了很多的乐器，但是本校的老师不会用，只能放在那里尘封，像古筝一类，老师自己不会用，又怎么谈得上教呢？”广州荔湾童声合唱团团长李慧坤是一名支教老师，平日通过远程的方式为乡村孩子上音乐课。

二、乡村教师的公共性

2020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注重发挥乡村教师新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厚植乡村教育情怀，塑造新时代文明乡风，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教师不再是传统的教书匠角色，而且被时代赋予公共性的重任，成为乡村现代话建设的引导者。[17]

2019年2月，教育部在中央4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颁布实施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据统计，我国有乡村教师290多万人，其中中小学近250万人，幼儿园42万多人；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近170万人，占58.3%。[21]

在逐步解决乡村教师老龄化问题以后，乡村教师的公共性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我离开县里的高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家在市里。虽然回到市里以后，工资待遇比不上县里，而且也没有编制，但是我还是想待在父母身边。”一位来自河北省保定市县城的英语老师这样说道。

一年前她通过考试从县里的高中来到保定市里的一所小学任教。从大学毕业后，她就在县里高中教英语，“归属感”是她离开县里的主要原因，“我从小就在市里长大，在县里工作总是没有归属感。”

这是很多青年乡村教师的现状。乡村社会的独特文化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渐瓦解，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随之淡化。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乡村教师，也逐渐与乡土社会疏离，对于乡村的归属感不再浓烈。

“我从乡里调到县城里去也是没有办法。我的家在城里，去乡里教书路程远而且也不安全，陪伴家人的时间也比较少。”有着三十多年教龄的韩良丽充满了无奈。这位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的老教师，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在乡里的学校工作了很多年。

据了解，从县城到她任教的乡里要经过一条省道，在这条路上，她差点出了车祸。

虽然在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下，乡村教师群体的学历正在逐步优化，乡村学校副科教师短缺的情况也在逐步缓解。但是，上述提到的职业认同感和公共性原则逐渐淡化，使得乡村师资队伍的稳定性问题逐渐成为乡村教育发展的阻碍。

访谈中可以发现，乡村教师心中大都有一份情怀，具体内容说不清道不明，但却是促使他们留下来的原因，可见公共性对于教师而言十分重要，不仅展现了教师群体的责任与担当，甚至决定乡村教师群体是否能够成为现代化农村教师的引导者。

然而，教师的公共性建设是系统性的，仅凭个人的一腔热血远不能达到。

实现公共性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给予乡村发展一定程度的资源倾斜。在立体的乡村教育建设中，激发乡村教师的乡土情怀。

三、乡村教师队伍的流动性

“最近几年，甘肃省出台了一项新的教师教育政策，以期培养‘多功能’教师，尝试改变一个老师教一个学校这种状态。同时，关于教师的能力培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甘肃籍公益人甘霖提到，“之前乡村里普遍存在的社育老师，没有编制、没有合同、许多都是农民的代课老师，现在几乎没有了。新近老师需要先去小学、中学锻炼，积累经验，才会升到高中，再到县城里面当老师。”

这样的消息令人喜忧参半。

一方面乡村教师有了个人发展，也带动了乡村学校的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起来的老师往往很难留住。

“人才积累过程也是人才逐渐流失的过程”，“从小学、中学、高中，能力有了，经验足了，不少老师会去城市追求更好的发展”，甘霖说道。短短几年里，能力发展起来的老师，快速地通过各种各样的评比、积分，脱离中国最偏远的地方。

“不是为了追求事业，只是想平平凡凡地生活。年轻教师与另一半长期两地分居，要么分手，要么离开乡村。有能力的年轻老师离开乡村是最简单不过的打算，也是在西北地区非常常见的现象。”商凝瑶表示。

“有时候与乡村学校挂钩了项目，等到第二年再去联系当地学校的负责人，有的已经去县教育局，或者离开乡村了。”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传播负责人韩宝月也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没办法只能重新对接，对项目毫无作用。可是，这种没有必要的消耗还不得不去做。”

合理的人才流动能够激发地区发展的活力，但是大量高素质人才外流导致乡村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影响乡村教育的长远发展。

201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文件中指出“力争使乡村学校优质教师来源得到多渠道扩充，乡村教师资源配置得到改善，教育教学能力水平稳步提升，各方面合理待遇依法得到较好保障，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逐步形成‘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局面。” [22]

从提高生活待遇到自我提升，从职称评聘倾斜到建立荣誉制度，从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到城乡教师流动，扶持力度层层加码。

建设稳定的高素质的乡村教师队伍，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发力。

于学校而言，建立合理的人才发展机制，为乡村教师的提升和成长提供支撑。于政府而言，健全相关政策，优化教师工资待遇，提升职业吸引力。于社会而言，认可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全方位保障教师权益。

各方合力为乡村教师群体建立起权利保护屏障，才有可能留住老师。

四、宁缺毋滥的乡村教师

由于乡村学校师资匮乏，一些地区在招聘老师的过程中降低标准，致使乡村教师队伍鱼龙混杂。加之多数乡村学生受家庭状况影响，无法充分获得父母陪伴，家庭教育缺失，使他们相对更容易受到伤害。

近年来，乡村教师性侵学生的报道屡见不鲜。

2012年，28岁的乡村教师刘军红因涉嫌强奸、猥亵多名小学女生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从2011年9月开始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军红先后多次强奸、猥亵小学生数量多达8名，其中5名女学生被强奸，3名女学生遭到猥亵，年龄最小的仅10岁，年龄最大的也只有13岁。[23]

2013年，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一名中学教师性侵至少8名女生，并致1人怀孕。事发地鹤峰县位于鄂西武陵山连片特困区深处，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0%以上。[24]

2016年，江苏某偏远乡村的小学教师吴良利用批改作业之机，两次对班上一名8岁女童实施猥亵。然而，在校长的“周全”安排下，这起案件被“雪藏”。2018年9月，吴良故伎重演，先后三次在教室当众猥亵班上7岁女童。[25]

“一位数学老师性侵了十四个未成年人。一个学校，只有这一位数学老师。如果这位数学老师被抓了，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孩子们会没有数学老师。”公益从业者邓多讲述了他经历过的一个实际案例。

在与相关教师、管理人员进行访谈时，邓多发现了更为惊人的事实：几乎所有相关人员都知晓这位老师的所作所为。“为什么没有人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呢？”邓多反问道，“原因在于，一旦这位老师被抓，村里的学生可能会失去走出大山的机会。在走出大山和惩戒性侵者面前，其他老师们选择了后者。”

这样的选择具有其基于现实的复杂性，但对于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事情都不应、也不能成为借口。“教育”二字，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能称之为教育，“宁缺毋滥”是建设乡村教师队伍必须要遵从的守则。

202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牵头联合8家单位开展打击、治理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七提升”专项行动。共批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437人，提起公诉3731人，筛查涉案教师339人。[26]

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始实施。

在新法实施的当天，教育部发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强调对学生欺凌、性侵害、性骚扰行为“零容忍”，规定了教职工应当制止常见学生欺凌行为，教职工和进校人员不得实施性侵和性骚扰行为。[27]

除此之外，《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将《未成年人保护法》涉及学校的具体规定予以细化，比如社会高度关注的强制报告、信息查询和从业禁止等制度，具有可操作性，有助于中小学校贯彻落实。

以上种种，使得不良教师无所遁形，有助于打造出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

刘慈欣在《乡村教师》中倾诉出了乡村教师的无奈和奉献：“当学校停电时（可能是因为线路坏了，但大多数时间是因为交不起电费），他给娃们上晚课。他手里举着一根蜡烛照着黑板，‘看见不？’他问，‘看不显！’娃们总是这样回答，那么一点点亮光，确实难看清，但娃们缺课多，晚课是必须上的。于是他再点上一根蜡，手里两根举着。‘还是不显！’娃们喊，他于是再点上一根，虽然还是看不清，娃们不喊了，他们知道再喊老师也不会加蜡了，蜡太多了也是点不起的。烛光中，他看到下面那群娃们的面容时隐时现，象一群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拼命挣脱黑暗的小虫虫。”[28]

第四章 载体：怎么教

从刘慈欣的作品里，我们能够窥见乡村教师的发展，甚至是未来的可能性。

从老旧土灰房到多层钢构楼，从粉笔黑板擦到多媒体投影仪，从木质桌椅到金属结构。随着多年来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投入，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不断升级。

根据本报告调查数据显示，乡村小学教室内桌椅为木质加金属骨架结构的比率为64.84%；多媒体专用教室的设置率达到了79.69%；拥有多媒体教室一个及以上的比率为78.13%.....

载体，是在明晰乡村教师现状之后，迫切需要被讨论的内容。这些载体决定了教师如何教学，是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更好的利用教学载体，弥补乡村教学过程中的弱项？乡村教育载体方面目前正出现什么问题？未来，关于教学载体将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无数个问题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回答。

一、教室内：新情况、新问题

（一）“极端”的手机普及与依赖

在农村，获取一部能够发微信、刷短视频的手机需要多少钱？

研究人员在对农村的实地探访中发现，乡镇通讯店铺中展示的不知名品牌手机，最低配置只需要175元，店员一再保证可以同时聊微信并刷短视频，如果想要打网络游戏，只需要再添一百元即可。

在店门口，两位年龄相仿的男孩坐在台阶上，他们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手指飞快地在电子屏幕上滑动、点击，娴熟的动作向人们透露出一个信息：手机游戏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农村，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90.3%，其中93.4%未成年人的上网设备为手机。[29]

“我们班上的手机持有率有近百分之八十，他们主要就是用来玩游戏、看抖音、聊天.....”一位多年在乡村中学教书的数学老师龚建军表示，“所以我们会开始限制他们携带和使用手机。”

2021年4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刘坚教授、刘红云教授团队发布了《全国首个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报告》。

报告呈现出的状况令人深思：城市、县镇中学学生拥有手机的比例为77%和70%，存在手机依赖和手机依赖倾向的比例为23%和26%，而农村中学学生的这两项数据超过了城市和县镇，分别为78%和30%。[30]

由此可见，在智能手机获得成本极其低廉的今天，手机依赖成为乡村教育的新痛点。

“我们原来还以为贫困农村的孩子很少会有手机。”英语老师唐颖考入乡村中学编制的第一年，便惊讶于手机在乡村学生中的高拥有率，“我的一个同事，这学期已经收了七八个手机了，都是因为在课堂上玩。”

即便作为旁观者，唐颖仍然深深体会到乡村教师的无奈：“最夸张的是，有个家长打电话给我同事，要她把手机还给孩子，但又要我同事管着孩子不要让他玩。”

河南省某小学的语文教师甄文怡也表示：“玩手机的现象真的挺严重。”

手机承载着无限的学习空间，是乡村孩子学习新事物、新知识最迅速有效的工具，如果使用得当，手机可以带来乡村教育的新变革。

但现实并不会如此美好，“这些孩子根本不会正确运用工具，也不会合理分配时间。”龚建军谈到。

学生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娱乐上，学校和老师便只能选择限制或是禁止手机的使用，即便如此，屡禁不止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乡村儿童的生活被粗制滥造的短视频和游戏填满，眼神中透露出用眼过度的疲惫和空洞无物的茫然，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互联网侵袭下的乡村教育困境，或许，限制和引导仍然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二）“混乱”的学习时间与空间

从乡镇向县城行驶不到20分钟，政府和社会捐赠的阅读室光鲜亮丽，各类电教化设备一应俱全。但图书束之高阁，阅读室沦为摆设。

再向外开足 1 个小时车程的农村，即将要撤点并校的村小，仅剩的十几个孩子和老师守着翻新没几年的教室。挂着图书室牌子的空屋子里，只有一块黑板和一堆散落的桌椅。

将目光从手机这一小小的工具转向学习的整个场景，研究人员发现，阅读似乎成为了乡村教育中最为棘手的问题。

龚建军所在的乡村中学每个班都有一个图书角，学校还专设了一间教室作为阅览室放置图书，据悉，学校现存图书有几千册，“主要是一些文学性的诗词、名著，著名作者的传记。”

但这些图书在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龚建军也说不上来。

“如果是学生自主来借阅图书的情况，低年级的可能会多一点，但总体而言都很少。”学生对知识性图书阅读的冷漠是造成学校图书室冷清的重要因素。

因此，龚建军的学校每周都会设置一节课阅读课，阅读老师由语文老师兼任，“之前就是放养性的，现在算是有了一定的指导。”

但这并没有根治阅读的“乱象”。

“仍然是那个问题，学生自控能力不强。”龚建军表示，“他们更喜欢看故事性的、情节性强的，而且在课堂上也会看，他们并不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而是追求娱乐。”

在互联网时代，与阅读同样重要的还有计算机能力的培养。

28 岁的李灵耳在四川一所村小担任班主任，她所在的学校并没有足够的电脑设备，“老师用的电脑有 6 台，学生没有电脑。”

然而，即便拥有电脑设备的学校也难以将它们落到实处，正如龚建军所介绍的，上锁的机房不在少数：“计算机房还是有的，也没怎么使用，平时就锁着。”

锁着的原因在于频繁的损坏和高昂的维修费，“电脑存量有近 50 几台，但能用的不到三分之二。”龚建军谈到，“总是修了又坏、修了又坏，学校就不愿意再修了。”

在一些基础设施够硬的学校，硬件资源早已不成问题。“但往往把他们束之高阁。”新氧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艾晓宇感叹，“因为没有人想去看图书馆里的书，没有老师会教电脑，又怕孩子们玩坏了。”

与之类似的还有音体美教室。2021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特别指出：要建设好必要的体育、美育场地和劳动教育场所，不断提升教育设施和资源利用率。[31]

调查显示，乡村小学美术专用教室的设置率72.66%，音乐专用教室的设置率为65.63%，体育活动室的设置率为51.56%，实际投入使用的却寥寥无几。

“都有呀，但就是没用过。”甄文怡谈到所在学校的音体美专用教室时表示，“政策是政策，现实情况又是不同的，我们也真的是无能为力。”

龚建军所看到的情况则更为糟糕：“这种功能性教室很少，我们只有个用来给特长生画画的教室，勉强可以称作美术室。”

（三）“联网”的教室讲台与黑板

一只三角板，一册课本，一张黑板，一支粉笔。十年前，龚建军每天便是依靠这四样物件，教授一堂45分钟的数学课。

课堂中，龚建军写下了满满的板书，时常还需要拿起黑板擦清理，粉尘在空气中飞扬，有的缓缓落在地面上，留下一层白色；有的被龚建军和学生们从鼻腔吸入肺部，留下隐患。

正是由于常年吸入粉尘，排名前列的老师职业病便是慢性咽喉炎。但这方面的忧虑已经逐渐淡化，“现在已经都不用黑板和粉笔了”龚建军表示，“学校装了电子白板，可以联网看课件，而且板书区域也变成了使用水性笔书写的白板。”

在龚建军看来，我国的教具一共变迁了三代，从传统的粉笔与黑板，发展到第二代的投影仪与幻灯片，最终到第三代是电子白板。而这样的发展，对于他的学校，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教具的发展呈现由实物化向电子化、信息化发展的特点，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电子化、信息化也为教学带来了积极的影响。”[32]

其实，电子化教具是一些企业、机构、高校在试图改变乡村教育过程中进行的尝试。乡村师资的匮乏、课本知识的有限、传统教具的局限……多方面因素推动了电子白板在教室中的普及。

作为教室中最为基础且关键的这一方讲台与黑板，也并非所有学校都已经完成了更新迭代。龚建军谈到：“我前阵子去一个更加偏远的学校监考时，他们那里都还是用的传统黑板。”

“有些老师教了那么些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案，并不能用上互联网新教具。”艾晓宇在《2020-2021 学年中国乡村教育观察报告》研讨会上在另一角度上提出担忧，“虽然硬件很好，但是这些硬件没有在教学中使用，就没了意义。”

龚建军的话证实了教师群体对电子白板的顾虑：“对于乡村里的小孩来说，老师把知识写在黑板上会让他们印象更深刻。”

“各有各的好。”他同时也肯定了新设备的优势，“互联网设备可以在网络上查询资料，它知识更新快、容量大。”

不同于城市学校可以通过集体备课实现教师的互通互助，由于班级较少，乡村中学往往每项目只有一至两位教师，教学方案基本依靠老师自主单独设计。

但互联网设备的发展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现在网上有公共资源，虽然不一定合适，需要自己多加选择，但总比没有好。”龚建军如此说到。

不论如何，从数据上来看，电子化教具整体的配置和使用状况是乐观的。这些配备在乡村学校的电子化设备，使用频率可以达到每天多次或每天一次，大都实现了高频使用。

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调查发现，乡村中学教室投影仪配备率达到了 89.13%，电子屏幕配备率为 69.57%，电脑配备率有 58.7%，三种设备使用频率为每天多次的比率分别为：84.78%，82.61%，78.26%。

“我们正面临传统教育模式同现代教育模式碰撞的窗口期，社会和学生都在要求我们必须从前者过渡到后者，”则洛小学副校长阿胜子曲表示，“改变是必须的。”

“利用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等，将大数据、人工智能融入到乡村地区教育中，使乡村地区教育能够享受到与城市教育功能类似的发展态势，在渠道上展现出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33]

交互式电子白板为师生的跨空间实时互动创造条件，有了互联网搭建的教学平台，一些新的教学模式也应运而生，例如希沃的“专递课堂”、新东方的“双师课堂”。

“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打破一切恐惧我能找到答案，丢弃所有的负担，不再孤单……”

在贵州毕节的团结小学里，孩子们身穿红白相间的校服，集体站在课桌前，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双手时而跟着节奏拍打，神情专注地望着镶嵌在黑板里的希沃白板，齐声合唱。

希沃白板的屏幕对面，连接的是一位远在广州荔湾的专业合唱团老师和广州荔湾童声合唱团。

这是一场跨越一千多公里的实时音乐课堂。

“邀请广大教师在线上同步参与希沃的软件及希沃学院活动，组建公益知识库，把各自的专业知识分享给乡村教师，助力教师成长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信息化教学水平。” [34]

这是在希沃公益行官网上的一段话，乡村学校老师与外部名师通过希沃白板共同为乡村儿童教学，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同时将更为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传递到乡村学校的老师手中。

根据官方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希沃累计捐赠 222 所学校，跨越全国 28 个省份，超过 36 万位学生、近 3 万位老师从中受益。 [34]

二、教室外：强基建、促均衡

“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学校教室、宿舍、食堂等设施建设，配齐洗浴、饮水等学生生活必需的设施设备，推动清洁取暖进校园和卫生厕所改造。” [31]

这是《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中的一段话，可见国家对乡村学校基础设施的重视。

下课铃响起，学生们纷纷涌出教室，四散开来。他们的目的地或许是操场，或许是卫生间，或许是宿舍……

除了教室内的教学设备，教室外是学生的释放和休闲场所。安全的户外设备和场地，便由此成了重要刚需，近几年的有毒跑道等事件，为每一所学校敲着警钟。

调查发现，乡村小学的跑道的配置率为 61.72%，操场的配置率为 82.81%。由此可见，学生的课外活动设施都有一定规模，跑道、操场这些使用频率较高的场地都有设置。

然而，操场、跑道、篮球场往往混合为一体，材质与场地面积也还处在较为基础的阶段。

例如跑道制式为 200 米环形跑道的制式的比率为 53.16%，400 米环形跑道的制式的比率仅为 25.32%；操场材质为水泥的比率有 60.38%，为 PU 硅/橡胶铺的比例仅 25.47%。

同样的，篮球场与足球场场地面积都普遍较小，有的学校甚至没有专用球框或球门。

值得一提的是，篮球场的配置率达到了 80.47%，而足球场的配置率仅为 12.5%。原因便在于乡村学校的篮球场一般等同于操场，同一场地，多方用途，而足球场无法实现融合。

“我们没有足球场，就只有一个 200 米跑道的综合性大操场。” 龚建军披露了乡村学校的现状，“甚至有些条件不好的学校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但他也表示：“每一个镇都有相对比较大的学校，政府也会更重视他们，那里的条件就会好一些，有更多的场地。”

“不论如何，比城区还是差很多的。”

这大概是大部分乡村教师的感受。

“我们学校塑胶跑道都没有，没有操场。”一位乡村语文老师谢丽媛谈到，“而且现在学校很小，只有两个教学楼，所以我们教室都不够，要借人家小学的教室。”

由于没有操场，学生上体育课时就在教学楼外边，锻炼以及打闹的声响十分容易传入其他正在上课的班级教室中。

在运动场地以外，厕所也是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尚待解决的一大难题，走访人员发现，不少乡村学校仍然使用着旱厕或接近旱厕的设施。

“我们学校的公厕很糟糕，是那种农村的老式厕所，一个斜坡连着粪便坑，有好几个坑都堵死了。”唐颖所任职的学校便是未经改造的旱厕。

“我们学校有建新厕所，这个学期已经建好了，但是因为没有水，一直没有用。”

不少学校拥有水厕，但学校并不开放使用，因为厕所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台设备，冲水厕所在运行过程中将消耗大量的水电，这些从何处来？

龚建军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焦点：“如果用冲水厕所，没这么多水，供不应求。”

因此，当一所乡村学校硬件设施不达标时，我们更需要关注背后的资源短缺问题。

同样，教室外的载体不仅包括学校基础设施，还涵盖了自然这一环。乡村教育的另一种探索是将自然转化为教育的载体。

在资源短缺的情形下，利用现有乡土资源，“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的教学模式值得一试。

“面向农村学生的素质教育和为生活而教，把课本知识和乡土文化融入其中，做植根乡土的教育、有根的教育、有机的教育、绿色的教育。”

在2021年3月举办的“做有根的教育·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研讨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说了这样一段话。

北京怀柔九渡河小学便为“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了一个优秀案例。

“我们办这所学校是为了 2035 年准备山村学校样本，同时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我们的解决方案。”校长于海龙介绍。

利用山村的资源，突破农村的限制，让教育与当地社会充分融合，这是九渡河小学的探索。

九渡河小学所有的空间和资源都围绕着学生学习的真实发生来布局。他们将山村现有的资源用作教学，教孩子们制作山货、种植蔬菜、设计冰车……渗透各学科知识，融合乡土传统文化。

正如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农村教育实验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汤勇所说：“纯朴的乡风民风，还有丰富的乡村文化民俗活动，完全可以进课堂、进校园、进课程，成为最好的教育。”

第五章 再分配：如何均衡？

在公众的印象里，乡村教育是什么样的？

破旧的教学楼、伤痕累累的木头桌椅、脱落的黑板、尘土飞扬的操场、上了年纪又身兼数职的教师……

不可否认，时至今日，这些词汇还是能精准对应到一些发展相对落后的乡村学校，无论学校与学生再怎么努力也收获甚微。

某些学校可以在政策扶持与资金帮助下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智能化教学水平、开展个性化教育等，但在“阳光”很难照到的地区，一套投屏装备、一个塑胶跑道、一间舞蹈教室、一间阅览室等，都可能成为一种奢侈。

一、无序的资源竞争

在西南地区某偏远山区的一所小学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将爱心企业捐赠的近 300 本书籍放置在书架上，还没等全部分类完毕，他们就已经开始津津有味地阅读。

在温度高达 35 摄氏度的房间里，孩子们红红的脸蛋和额头的汗珠也难掩内心的喜悦。伴随着窗外的蝉鸣，孩子们叽叽喳喳讨论着《十万个为什么》中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的问题，类似于《海底两万里》《鲁宾孙漂流记》等游记类书籍甚是受欢迎，还没登记入册就被孩子预约借走。

这是这所小学每年唯一一次阅览室书籍的更新，而在四川凉山州的某小学里，情况却截然相反。

在学校的走廊和仓库中，一排排课桌被码地整整齐齐，角落里零散放着装有崭新书包、文具袋的麻袋包，不同于公众印象中伤痕累累的木头桌椅，这些印着某集团捐赠字样的新式钢木学生桌椅不断向上堆叠，向上“生长”。

据介绍，该小学约有 3000 个学生，然而却拥有桌椅板凳约 5000 套，溢出率约 66.7%。在媒体的不断曝光下，“凉山”俨然已经成为贫困的代名词，各地的企业都愿意给凉山州资助，不管缺不缺，校方都秉着“先要来再说”的态度照单全收。

“明星贫困学校”与“普通学校”教育资源的差距亦是如此，表面上基于公正的教育资源分配却因起点、条件的差异而在本质上演绎了一场资源掠夺，教育资源分配的哪个环节影响了教育均衡的天平？

在我国，教育资源领域的分配仍遵循三次分配机制，但主体有所改变。初次分配是由政府主导，讲求公平与效率；再分配通过道德力量推动，组织与个人自愿捐赠进行分配；第三次分配由家庭进行，这是具有亲和力的，可以直接把握的非制度分配。

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初次分配中，部分地方政府未贴合实际需要，对单一学校进行“一窝蜂”式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总体教育资源的过度侵占。

2020 年 8 月，陕西一脱贫摘帽县耗费巨资 7.1 亿建设豪华中学的新闻令人咂舌。假山瀑布群、四层豪华喷泉、石刻鲤鱼像、水车、栈道、超标办公室等夸张的建筑设计无不彰显当地政府对教育的“出手阔绰”。

“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并无过错，但据本报告调查显示，该县一年财政收入不足 2 亿元，高达 7.1 亿的教育投资使得该县债台高筑，是“出手阔绰”还是“面子工程”一目了然。

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城乡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并未完全脱离政策主导，教育资源通过零星的政策不断倾斜、堆积，反而在更广阔的中国，仍有部分乡村学校没能充分享受到资源的优惠，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陷入“强校更强、弱校更弱”的恶性循环。

正所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教育资源分配目的早已背叛了教育公平本身的内涵，成为一场场毫无价值的教育政绩游戏或教育管理者的孤芳自赏。

文军、顾楚丹在《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差异及其社会后果——基于中国教育统计数据的数据分析》一文中指出，一种地位的落差被个人长期所感知，带来的就是个人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而被身处相同境遇的群体所感知，引起的则是整个社会对当前教育不公平、社会不公平的一个价值判断，而这种不公平直接作用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35]

二、公益力量的优化

疫情暴露出的城乡教育、强校弱校巨大差异使得“不公平”的声音愈发震耳。

当一部分学校响应国家号召，热火朝天地实践“停课不停学”，探索线上直播、构建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等新型教学方式时，一部分学校与孩子却因为基础硬件条件的不足，教育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当一部分学校学生熟练使用电脑、平板、智能手机来高效准确获取教育资源时，另一部分学校家长与孩子还困惑于如何获得手机流量、如何使用各种复杂的链接端口、如何线上交作业等基础性操作问题。

始终难以跨越的教育鸿沟使得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广泛受到质疑，虽然政府主导的初次分配规则对于教育公平的正效应是肯定的，但因身份、基础设施、地位的区隔等原因也使得负效应突出，再分配促进社会教育公平的理念愈发被重视。

通过道德力量推动，组织团体与个人自愿捐赠，作为对教育政策的补充，再分配对教育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本报告调研数据显示，大多数乡村学校都或多或少地接收到来自社会公益团体和个人的捐助，公益资助的形式也愈加多样，如捐助资金款项、教辅资料、阅览室、音乐室等，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乡村学校的教育资源，促进学校的提升与发展。

在互联网发展的浪潮中，再分配的理念与手段得到升级，使得分配环境得到了极大的优化。

首先，分配理念由单纯的物资捐赠 1.0 时代，逐步过渡到多元化提升教育硬、软实力的 2.0 时代，作为基础性资源能够为教学事业赋能的教师队伍、优质课程等被重视。

例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发起的马云公益基金会，在乡村教育人才激励、培养和校园基础设施等方面持续发力，相继开展了马云乡村教师计划、马云乡村校长计划、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和马云乡村寄宿学校计划等。

据资料显示，五年来，马云乡村教育计划直接资助培养 500 位获奖老师，60 位入选校长，200 位入选师范生；试点 9 所寄宿制学校，提名教师 390 人，校长 60 人，师范生 220 人，直接影响学生近 11 万人；760 位获奖和入选者通过担任培训讲师和分享嘉宾，直接影响乡村教师近 30 万人次。[36]

类似的还有由新东方发起成立的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其以“通过公益的形式推动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使用创新技术推动教育的公平性”为宗旨，相继开展“大学生自强之星”“烛光行动”“一校一梦想”“希望小学”“春蕾助学行动”“公益图书馆”等项目，在资助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促进教育资源共享，赈灾济困方面持续努力。

据资料显示，11 年来，“大学生自强之星”项目已培养 110 名“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1097 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以及近万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提名奖获得者；“烛光行动”项目已为 30 多个省市、90 多个地区的 30000 名乡村教师进行了义务培训；“一校一梦想”项目已为 25 所学校解决“个性化”困难；“公益图书角”项目先后为近 50 所中小学校捐赠 3 万余套图书……[37]

从自驱动角度为乡村教育带来的优秀师资力量本身就是一口活井，源源不断地产出并整合教育资源，将之利用最大化。

其次，再分配手段也愈加丰富，互联网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间与空间偏向，人人都是互联网的主体，呈现出全民参与教育资源再分配的大趋势。

来自河南某高校学生李文热衷于“蚂蚁庄园”项目，通过完成任务赢取饲料进行云养殖，通过把收集的爱心鸡蛋转换成爱心值进行捐赠，爱心值被量化为资金或物资直接分配到她想捐赠的学校。2018年的校园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项目是她首次捐赠的项目。

“我被项目介绍上的图片所震撼了，太阳很大，小孩子排着队，眼巴巴看着一口水窖，水窖里的水略显浑浊，但也是这所学校的饮水用水唯一来源。”李文说道，“这是我从来没想到的，这可是生命之水啊。”

通过诸多微小力量汇聚，教育资源再次被整合并分配。此次再分配中的道德力量使分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不是国家意志，具有极强的灵活性，整体上优化分配环境。

但如何促进这些力量可持续发展？如何避免这些力量再次陷入依附政策的困境，甚至加大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三、资源需要精准适配

“老师，你会不会走啊？”每当有新老师加入，学生们欢喜之余也忧心忡忡。

这一部分乡村学校，老师需要是全能的，随时做好添加新科目的准备，然而这里的全能也意味着“全都不能”，因为没有谁是全能的。

熊进在《国家主导下的教育分配正义实践：批判与检省》一文中指出，教育资源分配均衡是教育公平的基础，如果将教育公平进行解构，可以将其内涵分解为由教育机会、师资队伍、财力资源等概念构成的集合。[38]在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的过程中，这些概念被“物化”、“量化”，教育资源数量的比拼成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

对于物化指标的重视确实使教育资源分配均衡的过程变得简单，但也变得粗糙，这从陕西豪华中学与四川凉山州过度闲置捐赠物资里就可见一斑。

当组织或机构因自身经济实力而具有再分配教育资源的能力，其后续分配行为容易陷入自我感动，而非真正符合有效捐赠逻辑。

明星古天乐热衷于公益事业，曾捐赠建立多所小学，但近日网友曝光其在遵义市花费数十万建立的一所农村小学已荒废三四年。舆论第一时间倒向捐赠者，网友表示“不要把捐赠者的钱不当钱”。

但事实上，村办小学的情况并不明朗。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加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农村学生生源正在不断减少，种种因素层层叠加导致乡村学校也在逐渐消失，古天乐捐赠的小学只是其中之一。

在调研中发现，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远比一股脑进行资源投入更加重要，“因地制宜、资源对口”是关键一点，即资源引导者、资源需求者、需求供给者三方的匹配。

以杭州某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为例，据悉，该中心成立于 2005 年，其发展过程便经历了“由爱发力”到“专业的项目运作”的转变。

高水平社工辅助组织架构，理事会出钱支持行政经费，爱心企业、基金会等长期合作支援实践经费，教育系统人员负责策划执行项目，媒体、律师、政府人员组织监督，五个紧紧相扣的环节成为一个闭环，最大程度挖掘与利用教育资源，直接作用于教育帮扶对象。

对于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来说，文军、顾楚丹在《教育公平向何处去？——基于教育资源供给三阶段得思考》一文中认为，政策干预应不再聚焦于对资源的弥补，而要找回主体的造血功能，通过积极的整体干预来回应可能造成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因素。[39]

例如优质教师资源的输入、乡村教师待遇的普遍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发展、优势挖掘与多元激励等。

更深入来看，促进教育均衡应由简单的“物化分配”形态向关注教育生活中“人化”形态转变，教师是乡村教育中关注人的主体，关注人的丰富性与生命性内涵，因此，乡村地区教师队伍的建设也成为再分配均衡教育资源中的关键突破点。

第六章 家庭：怎样持续？

坐在台阶上玩手机的学生，往往成为摆在家长、学校、老师面前的一大难题。那么在智能手机获得成本极其低下的今天，让孩子沉迷手机的原因是什么呢？游戏又是否是这个问题的“原罪”？

“没人管，没人陪。”简单的回答过后，邓多叹了口气，“所有孩子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家庭身上找原因。”

一、缺失：家庭教育身在何处？

“在贵州一贫困县的健康快车义诊中，一个四岁的孩子牵着一个三岁的孩子去看牙。”这是邓多分享的一个画面，“家庭在教育当中扮演着公认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乡村教育中，家庭极其脆弱。父母都要外出务工，是孩子在管更小的孩子。”

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起点和基础，家庭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

然而现实的尴尬则是每年过年前回来、过年后就走的父母。

“搁家不挣钱，没花的”，韩春梅是任亮的妈妈，对于这个13岁就很“社会”的儿子，她束手无策，“地一年能打多少钱？他一个月就得花个大几百，不够啊，老人再生个病，诶”。

韩春梅的感叹看起来十分普遍，在她所居住的村落，每年近8成劳动力都会从东北南下到河北霸州家具作坊务工。

一个村子的孩子，就都成了留守儿童。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曾表示：“与2016年数据相比，2018年0至5岁入学前留守儿童占比从33.1%下降至25.5%，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65.3%上升至71.4%。” [40]

本报告的调查数据也有相关指向，在受访的样本学校中，平均每个学校的留守儿童数量为207.28名。

对于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来讲，学校成为他们第二个家。一年下来与老师相处的时间可能比家长还要多。

在回答“参加家长会的家长中，占大多数的是？”问题时，1230名小学教师有1050人选择了“爷爷、外公”这一选项，占比最多。

外出务工家庭父母角色缺位，导致留守儿童缺少陪伴也缺少家庭教育。

中国教育学会特约观察员陈铁曾表示：“从事农村小学教育工作三十五年，我感觉现在的学生越来越难教，并不是我们教师不热心工作，不努力教育孩子，其实有很多问题出在家庭教育上。现在的农村家庭教育可以说是严重缺失，不仅影响了学校教育的质量，更影响了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41]

孩子学习成绩差、逃课、打架、去网吧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仅归结于学校教育。学校的责任在于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提供获取知识的场所。在家庭教育中，家人的关爱、父母的陪伴、和谐有爱的家庭环境对孩子以后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入骨髓的。

在《赣南农村家庭教育调查研究》中，吴磊写到：“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的依赖也日益凸显弊端。” [42]

在调研过程中，广德中学的一名数学教师谈到家庭教育问题时表示，“有的学生家长对孩子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问。学习上不管，生活上也不管。孩子在学校里面犯了错误以后联系家长，十次有九次是打不通电话的。你叫他来学校，他也不来。”

家庭教育在造就人才的启蒙教育和全人指导的终身教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学校教育替代不了家庭教育，家庭、学校、社会，三者责任缺一不可。

“学校总想着把家长的活也干了，学校为学生考虑，要把文化课、体育课，所有的工作都承包下来，家长就不用操心了，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对。有些家长对孩子不关心，不知道孩子在学校到底什么情况。”乡村体育教师张风也谈到了学校与家长之间的问题。

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起点和基础，在塑造儿童行为习惯、文化素养、道德品行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 201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对家庭教育提出要求：“积极推动将家庭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争取专门经费支持，通过家委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购买服务等形式，形成政府、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育工作体系。” [43]

徐佑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家庭教育问题探析》中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乡村振兴，教育先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让爱回家，让家庭教育回归本位，让孩子成为生活和学习的主人，在自由、快乐和自主的环境中健康成长。[43]

二、方法：正确教育弥足珍贵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在乡村教育调研过程中，除了家庭教育的缺失，还存在父母教育意识淡薄和教育方法不正确的问题。这些父母在生活学习中会教育自己的孩子，并提出要求。相比家庭教育的缺失，家庭教育不到位也是乡村教育问题的其中之一。

“多数农村家长缺乏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意识。”在李晓菊等人撰写的《农村家庭教育现状调查》中提到，“我国一部分农村家长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并缺乏学习愿望。我国农村虽然基本上扫除了文盲，但家长的文化水平仍然不高，需要进一步提高。”[44]

1966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发布了“科尔曼报告”，指出家庭背景比学校质量、教师经验因素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更大。虽然，后续的研究指出“科尔曼报告”存在许多技术方法上的不足。不过,通过国内外大量的研究发现，仍然得出相似的结论。[45]

在乡村家庭,父母们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他们会不会放弃对子女的时间投入,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物质投资?教育意识的偏差让他们陷入误区，时间和情感上的投入并不能与金钱投入画等号。

学生不听话，老师向家长反映情况，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不用管他，不死就行。只要不让他当小偷，学不学无所谓。”一些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处于放养状态，遵循着原有的旧思想，凭自己的经验教育子女。

在本次调研中，面对“在您看来，家长在贵校的教育工作中起到了什么角色？”问题时，有很大一部分教师选择了“家长缺位”这一选项。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长大后的言行举止、做人做事都会受到影响，家长的缺位，也会造成孩子内心情感的缺失。

三、那些待解的流动家庭教育难题

除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本身也是基于乡村背景，其家庭的教育问题本身也属乡村教育的一部分。与留守儿童一样，流动儿童的未来，也值得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在有关中国人口流动文献《离城不回乡与回流不返乡》中指出，在城市人口政策与家庭内部决策双重影响下，农民工家庭成员在城乡间“钟摆式”或“候鸟式”流动。例如，农民工子女在“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流动儿童”两种身份中转换。[46]

辜美惜、郑雪、邱龙虎认为：“流动儿童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心理压力过大，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问题突出，问题行为突出，自我评价、自我发展和自尊水平都偏低，人格健康水平也偏低。”[47]

那么造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本报告调研中发现，流动儿童背后代表的是一个流动家庭，流动家庭自身所具有的，会影响儿童的生活和学习。乡村父母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将孩子带到城市上学，平衡基本生活与子女教育，是探访中诸多家长提出的难题。

而家庭的经济条件则是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根本制约因素，他们需要既要满足子女的正常生活又要为子女提供相应的教育资金。要想赚取更多的工资意味着要减少陪伴孩子的时间，金钱与时间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流动儿童家长自身的文化水平也制约了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

这些父母大多是工人或小商贩，为了生活四处打拼，无法关心到子女各方面的发展情况。重养轻教，平时只能给予孩子生存所需物质上的满足，精神上关注的很少。教育子女方法简单粗暴，缺乏辅导孩子学习的能力，致使流动儿童的学习得不到有效的督促和引导。

此外，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曾一度引起社会关注。“没有本地户口，就不能进学校上课。”异地高考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很多流动儿童面临着四处换学校，陷入“借读”的尴尬境地。

甚至很多在京务工子弟，都在涿州、高碑店、廊坊等河北县市上学读书。

现实摆在面前，四处借读的流动性带给孩子极大的不安全感。孩子们往往都是刚熟悉校园环境，但却因为流动问题，又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2014年国务院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全国层面推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即“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48]

韩嘉玲、余家庆在论文《离城不回乡与回流不返乡》中介绍到“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纷纷出台了人口、产业、教育等方面的疏解政策，很多流动人口被迫离开了生活及工作多年的大城市。其中，教育疏解给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影响。”[46]

面对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政策，子女无法继续在流入地城市读书的乡村家庭需要考虑家庭经济状况、社会资源、各类学校情况、父母或家人能否陪读等多种因素，为子女做出自己可负担的、最符合家庭实际情况的教育抉择。

无论是留守儿童问题还是流动儿童，所涉及到的都与乡村家庭教育有关。而家庭教育不仅仅需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学校与政府、社会都应该成为帮助其解决问题的助力器。

首先，学校可以与学生家长一起努力，实现家校合作共同教育。郝文武说：“做好家校合作共育已是现代城市中小学和幼儿教育常态，许多农村也很重视家校合作。”[49]家校合作不仅可以帮助乡村孩子感受家庭的温暖，也可以建立起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双重保障，让乡村孩子的教育问题真正实现“两条腿走路”。

其次，政府和社会应积极应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家庭的教育问题。

解决家庭教育问题有一定的困难，但从育人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不得不解决的一大问题。例如针对流动人员家庭教育问题，官渡区教师蒲晟吉提出：“建立社区儿童少年教育和监护体系，增强和发展社区教育的作用。建立以家长学校为平台的培训机构，对家庭教育进行科学指导。”

家长的文化水平会对孩子的教育产生影响，因此从家长的角度出发，加强培训。使他们得到较为科学、全面的家庭教育指导，对流动家庭来说十分重要。

“教育振兴是整个乡村振兴的基础，解决代际贫困就是要靠教育。”商凝瑶谈到，“教育振兴是最公平、最容易实现的办法。要想振兴乡村，首先必须面对乡村教育的种种症结。”

周四梅说：“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而且反复的教育活动，仅凭家庭方面的力量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50]想要摆脱目前乡村家庭教育存在的困境，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和政府的帮助与支持。

在 1280 名小学教师中，有 89.8% 的人选择“老师或校长定期家访或探望”一项。“专门的心理疏导等帮助”也被 73.4% 的教师选择。

家庭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不能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割裂开来，家庭、学校、政府需要建立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之上，形成良性的资源流通、资源共享。

只有家庭、学校、政府积极参与进来，才会改变乡村家庭教育的现状，弥补乡村家庭教育缺失的一课。

参考文献

- [1]汤颖,邬志辉.新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困境与路径[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9,11(03):58-63.
- [2] (英) 斯宾塞尔, H.著;胡毅译.教育论 智育、德育和体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 [3]吕素锋.农村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现状的调查研究--以 L 地区为例[D].聊城大学,2019.
-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网站《乡村振兴必先振兴乡村教育》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8/201903/t20190311_372928.html
- [5]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5/content_5551609.htm
- [6]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12/content_5451352.htm

- [7]关于组织开展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
http://www.wenming.cn/ziliao/wenjian/jigou/zhongxuanbu/201203/t20120314_560524.shtml
- [8]《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 1998 年 12 月 24 日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177/tnull_2487.html
- [9]郭祎婧.大学生短期支教问题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8(24):116-117.
- [10]李朔菲,刘世玉.大学生短期支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评论,2019(06):63-67.
- [11]郑烁纯,张雯静,林楠琪,罗安宁.大学生短期支教现存问题与发展途径探析[J].科教导刊,2021(01):180-181.
- [12]罗敏.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扶贫的启示[D].贵州师范大学,2018.
- [13]汤颖,邬志辉.新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困境与路径[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9,11(03):58-63.
- [14]《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 2019》：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成效明显 . 中国政府网[引用日期 2019-01-13]
-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有关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7050/202105/t20210514_531434.html
- [16]真爱梦想研究院.<http://www.adream.org/curriculum/>
- [17]教育部.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EB/OL].(2020-9-4)[2021-7-22].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9/t20200904_485110.html
- [18]新华网.教育部：乡村教师队伍结构趋于科学合理 地位待遇明显改善
[EB/OL].(2020-9-4)[2021-7-22].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20n/2020_zt16/mitibaodao/202009/t20200907_485978.html
- [19]教育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
[EB/OL].(2020-10-16)[2021-7-22].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555/djzw/202010/t20201016_494880.html
- [20]中国教育报.2018 年中小学开齐开足美育课[EB/OL].(2016-4-7)[2021-7-22].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6n/xwfb_160406/160406_mtb/201604/t20160407_236945.html
- [21]教育部.加大落实力度 加快补齐短板 努力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乡村教师队伍
[EB/OL].(2019-2-26)[2021-7-22].http://www.moe.gov.cn/fbh/live/2019/50340/sfcl/201902/t20190226_371169.html

- [22]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EB/OL].(2015-6-1)[2021-7-22].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506/t20150612_190354.html
- [23]中国新闻网.乡村教师涉强奸猥亵8名小学生:受害者多留守儿童[EB/OL].(2012-6-19)[2021-7-22].<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06-19/3972114.shtml>
- [24]中国青年报.禽兽教师频现 谁是背后黑手[EB/OL].(2013-9-6)[2021-7-22].http://zqb.cyol.com/html/2013-09/06/nw.D110000zgqnb_20130906_1-08.htm
- [25]江苏检察网.泰兴检察建立性侵犯举报调查问责和惩戒机制[EB/OL].(2019-4-3)[2021-7-22].http://www.jsjc.gov.cn/yaowen/201904/t20190403_776984.shtml
- [26]央广网.广西检察机关批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437人、筛查涉案教师339人[EB/OL].(2021-5-28)[2021-7-22].http://gx.cnr.cn/cnrgx/yaowen/20210528/t20210528_525498610.shtml
- [27]教育部.全面提升未成年人在校保护水平[EB/OL].(2020-6-1)[2021-7-22].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1/53477/sfcl/202106/t20210601_534671.html
- [28]刘慈欣.乡村教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224
- [29]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R].(2020-5-13)[2021-7-25]
- [30]北京师范大学刘坚教授、刘红云教授团队.《全国首个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报告》[R].(2021-4-16)[2021-7-25]
- [31]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意见》[EB/OL].(2021-6-23)[2021-7-2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7052/202106/t20210630_541230.html
- [32]叶蓓蓓,冯绵绵.实物化、电子化到信息化:新中国小学数学教具的演变[J].课程.教材.教法,2019,39(07):68-75.
- [33]崔勇前.乡村教育振兴的基本思路与现实困境[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06):97-99.
- [34]希沃公益行官方网站.[2021-7-23].<https://gongyi.seewo.com/>
- [35]文军,顾楚丹.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差异及其社会后果——基于中国教育统计数据的数据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02):33-42+117.
- [36]马云公益基金会官方网站.[2021-7-23].<https://www.mayun.xin/#/home>.
- [37]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官方网站.[2021-7-23].<http://www.neworiental.org/foundation/index.html>.

- [38]熊进.国家主导下的教育分配正义实践:批判与检省[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06):63-69+76.
- [39]文军,顾楚丹.教育公平向何处去?——基于教育资源供给三阶段的思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01):22-29.
- [40]中国新闻网.民政部:截至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EB/OL].(2018-10-30)[2021-7-22].<http://www.chinanews.com/sh/2018/10-30/8663623.shtml>
- [41]中国教育学会.基教观察 | 农村家庭教育缺失,谁来补上这一课?[EB/OL].(2017-2-14)[2021-7-22].https://mp.weixin.qq.com/s/lbZ-x_00z81dY5zqI8gbpA
- [42]吴磊,钟国芳.赣南农村家庭教育调查研究[J].农业考古,2007,(4)(06):370-373.
- [43]徐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家庭教育问题探析[J].当代家庭教育,2019(06):19.
- [44]李晓菊,常荣兰,陈凤杰,王凤珍.农村家庭教育现状调查——以承德市八县三区农村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09):4287-4289.
- [45]祁翔.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来自中国农村家庭的调查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3(09):73-79.
- [46]韩嘉玲,余家庆.离城不回乡与回流不返乡——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子女教育抉择[J].北京社会科学,2020(06):4-13.
- [47]马林夕.流动儿童心理韧性的问卷编制和现状分析[D].苏州大学,2014.
- [4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EB/OL].(2014-7-30)[2021-7-26].[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_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www.gov.cn\)](http://www.gov.cn)
- [49]郝文武.建立以校为主的农村家校合作教育共同体[J].当代教育与文化,2020,12(04):11-15.
- [50]周四梅.我国农村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文教资料,2010(35):133-134.

项目组说明

本报告由南方周末立项,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南方周末公益基金资助,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乡村教育观察报告》项目组执行。

版权

本报告由南方周末制作,报告中所有的文字、图片、表格均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保护。

免责

本报告中的调研数据均采用样本调研方法获得，其数据结果受到样本的影响，部分数据未必能够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因此，本报告只提供给个人或单位作为参考资料，研究方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成员

统筹撰稿：郑 硕、赵明鑫

内容支持：张艺凡、雷冉冉

调研支持：董珮瑜、吕澄欣、贾思怡

数据支持：吴郁蓉、刘春晓

访谈支持：陈 晨、汪 鑫、李新荣、娜仁通力嘎

鸣谢

机构：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广州市视源公益慈善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保定学院、北京益动燕赵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发展中心、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天津市新氧公益基金会、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

个人：陶龙渤、赵 娜、刘 霁